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

(2012—2013)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 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 (2012—2013)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 编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 2012~2013 / 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编.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009-4918-3

I. ①国… II. ①国… III. ①体育-关系-哲学-文集 IV. ①G8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8654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6 开本 29.5 印张 636 千字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009-4918-3  
定价: 90.00 元

---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8 号 (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 67151482 (发行部) 邮编: 100061  
传真: 67151483 邮购: 67118491  
网址: [www.sportspublish.com](http://www.sportspublish.com)

(购买本社图书, 如遇有缺损页可与邮购部联系)

# 目 录

《申报》体育传播研究 .....	肖鸿波 (1)
构建重大体育赛事媒介传播效果的量化指标体系研究 .....	黄右涛 (15)
国家队运动员微博管理制度、体育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研究 .....	温 文 (28)
基于二经普数据的我国体育组织机构研究 .....	张 立 (59)
基于改善民生的体育城乡协调发展路径与模式研究：以“健康重庆”为例 .....	戴晓敏 (83)
经济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成年人体质状况、归因分析及健康促进研究 ...	谌晓安 (93)
竞技体育行业不正之风的成因、特征与预防对策研究 .....	闫旭峰 (104)
伦敦奥运会国家奖励标准研究 .....	高志丹 (114)
儒家人文精神与我国体育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	曹 莉 (132)
社会体育指导员分类培养的探索研究 .....	吴艳红 (143)
体育需求与消费的经济学模型及实证检验 .....	张 若 (161)
我国城市体育游憩空间的精明增长机制研究 .....	何 丰 (179)
我国青少年体育竞赛体系改革路径研究 .....	柳鸣毅 (190)
中国团体操的传承与创新研究 .....	黄宽柔 (209)
安徽省徽州民俗体育流变研究 .....	冯 潮 (233)
发展体育事业的政府公共职能研究 .....	杨茜萍 (246)
高尔夫球场规范化发展的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	王小平 (262)
马约翰体育思想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	刘静民 (271)
培养发展我国群众体育组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裴立新 (286)
体育学术期刊在我国建设体育强国中的作用研究 .....	邱剑荣 (311)
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实践与理论研究 .....	史友宽 (325)
我国大型公共体育场馆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改革研究 .....	李艳丽 (340)
我国体育产业的行业结构布局及政策研究 .....	童莹娟 (351)
我国退役运动员再就业因素、政策及机制研究 .....	刘春华 (365)
新媒体环境下体育舆情监测与应用研究 .....	曹 勇 (382)
政府体育公共服务标准体系构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	孙庆祝 (414)
中国反兴奋剂法制体系的建构与完善 .....	赵 健 (432)

# 《申报》 体育传播研究

上海体育学院 肖鸿波

## 1 《申报》的历史变迁轨迹

《申报》由英国商人安纳斯特·美查于1872年创刊，是上海最早的商业性中文报刊之一，于1949年5月27日终刊，前后历经了清末、民国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共计77年，这77年，是中国人民历经坎坷与半封建半殖民不断抗争，并使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而《申报》见证了这一过程全部的历史事件。因此，无论哪个专家和研究者，只要是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史，都必须到《申报》中寻找历史的证据和史料。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殖民主义的入侵，中国门户开放，1843年上海与广州、厦门、福州、宁波等五个城市同时开辟为商埠，开埠以来，上海由于非同寻常的地理条件：背倚中国最富庶的江浙两省，紧靠长江的入海口，北连青岛、天津和大连，迅速成为殖民者心目中的福地，并在上海开辟租界，在租界里，各种洋行、店铺、仓库、码头迅速出现并不断扩张，上海也逐步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航运中心和进出口贸易中心。

商业的发达、人口的增多（当时上海人口已经达到50万人，相当于现在中国中等城市的规模）自然需要产生大量的信息需求，考察世界近现代新闻产生的历史就会发现，为什么在15世纪威尼斯会产生手抄报纸，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商品贸易的频繁需要新闻信息的支撑。因此上海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取代香港成为中国最大的报业中心，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海就出现过大大小小中外文报刊共计31种，当然这些报纸大多数为外国人所办，《申报》就是这31种报纸中的佼佼者。因此《申报》的出现和发展不是偶然，它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的原因。

《申报》创刊之初，就与当时的上海字林洋行办的《上海新报》产生了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次新闻竞争，这次竞争历时8个月，最终是以《上海新报》的倒闭而告终。《申报》取胜最根本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申报》采用本土化战略，完全启用本地人办报，早在创办之初，就聘请了当时深谙上海世道的蒋芷湘、钱伯昕、何桂笙等中国人，并不惜花巨资将其送到香港的《近事编录》去培训，美查虽然也参与报纸经营，但很少过问报纸的编辑事务，只是凭兴趣偶尔写写评论，其二，廉价策略是《申报》战胜《上海新报》的重要法宝，当时《申报》用毛太纸印刷，每份只售8文，而《上海新报》是用瑞典进口的白报纸印刷，每份售价30文，虽然《上海新报》也曾经降价8文发售，但终究经不起亏损，关门大吉。这种灵活务实的经营策略和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申报》发展至关重要的法宝，也是《申报》

77年中无论风雨变幻而屹立不倒的秘诀。

纵观《申报》七十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将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考虑到报纸发展变迁中的特殊规律，这些阶段的划分并不参照传统的近现代的历史时期来划分，而是根据其内部人事变动和产权变动来划分，当然也适当考虑到重大历史时期对《申报》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影响。

### 1.1 美查时期（1872—1889年）

安纳斯特·美查 1860年（清同治十年）来到上海，与哥哥菲尔特里克·美查一起从事进出口贸易，将中国江南一带的丝绸和茶叶贩运到欧洲，又从欧洲把洋布等工业日用品贩运到中国，在上海开办了第一家火柴厂，稍后又开设了江苏药水厂，刚开始赚钱不少，到70年代经营逐渐走下坡路，正当一筹莫展之时，买办陈莘庚建议开办报纸。十几年的上海经商经历，加上对此时发达的英国报业的了解，美查决定与他的英国朋友伍华特、普莱亚和约翰·瓦基洛共同集资1600两银子，购进印刷机器、铅字和其他设施，创办报刊。美查成为《申报》的全权负责人。至1889年，《申报》事业蒸蒸日上，发行量过万份，美查将《申报》股份折价转让，共计得金10万两白银，十七年间，美查赚得盆满钵满，衣锦还乡，美查的经办《申报》的成功主要归结起来有两点值得借鉴。

首先，“义利两立”的办报目的，美查办报的目的与他经营药水厂的目的并无二致，完全通过办报来赚钱，报纸在他眼里就是一种商品，这一点，美查毫不讳言：“新报之开馆大抵以营生为生计……若本馆之开馆，余愿直不讳焉，原因谋利所开者耳，本馆不敢自夸为照义所开，亦愿自伸其不全忘义之怀也”，这种通过办报赚钱的思想，其实无可厚非，在经营《申报》期间，美查不遗余力推广报纸，不仅将报纸推广到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而且在他经营期间，远在内地的重庆、长沙都能看到《申报》。同时，采取“华廉洋贵”的方针开辟广告的经营渠道，洋人的广告价格是中国人的广告价格的4倍，以此来培育市场，并且通过经营其他产业来获取赢利，在美查经营期间，《申报》馆出版《瀛寰琐记》《四溟琐记》等月刊，出版《民报》等通俗白话报纸和《点石斋画报》，经营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这些多种经营的路数，都是为了报馆挣钱，事实上，美查本人也所获甚丰。这种通过办报赚钱的思想其实从客观上为中国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探索了不少先进的经验，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种报纸无不是有自己利益考虑的，许多很好的经营市场的方法与当年的《申报》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报馆的谋利不能不与华人读者和时代的需要相违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美查反复强调“义”，“所买之报皆属卖给华人，故依持者唯华人，对国家使除其弊，望其振兴，是本馆所以为中正之道”。为此，美查启用中国人做报馆的主笔，为了维护华人利益，为中国的兴利除弊，美查本人也写了不少评论。美查办报期间发生的很多新闻事件，《申报》都能挺身而出，为中国人说话，为下层百姓说话。1874年的日本入侵台湾，《申报》做了详尽报道，而且其评论都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的连续三年67篇报道，对冤案的最终平反昭雪起到很好的舆论影响作用。

这种“义利两立”的办报思想，对平常的新闻报道也起到了很好的保证作用，

早期《申报》的新闻报道注重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极力扩大报道面，来满足读者的需求，不管是国家大事、金融贸易之信息，还是乡间里巷的各类社会新闻，都包括在《申报》的报纸版面中，甚至各种谈鬼说狐之作，也照登不误，成为人们茶余饭后之谈资笑料，“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是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正因为这样宽广的报道面，人们并不怎么关心的体育新闻业能经常出现在版面上，在《申报》创刊的当天就刊有体育新闻《驰马取胜》，尽管这则报道与当今的体育新闻报道理念相去甚远，但毕竟是中国早期新闻报道中为数不多的体育报道。

其次，文人主政是美查期间《申报》的一个重大特色，美查与当时许多外国报刊所不同的高招就是，用本地旧文人办本地报纸，这是美查的一个创举，此前的中文报刊《上海新报》《六合丛谈》的编辑都是聘请到中国来传教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一个个都是“中国通”，熟悉中国的风土人情，但是“中国通”毕竟不是中国人，文化的差异、对中国文人阶层的陌生成为这些报刊融入中国社会的很大障碍，因此虽然办报之初也雄心勃勃，但终归走不了太远。而美查却将笔政完全交给旧中国的秀才们，这些旧文人对中国的信息需求，对《申报》的目标受众的中国文人的各种喜好熟捻于胸，因此报纸更能为中国受众所接受，更能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尽管当时的人们多瞧不起供职报馆卖文为生的，左宗棠就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路”的说法。但为了不错的薪俸，这些“落拓文人”将报纸办得风生水起。

由于旧文人自身的许多局限，尽管像钱昕伯这样曾经到香港“进修”三个月的秀才们，在办报的过程中仍然对新闻传播的规律掌握不够，对新的事物不够敏感，因此也导致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申报》的报道往往总是千遍一律，新闻版面的编排、新闻的写作方式、新闻报道的内容，甚至是置于报首的各种论说都没有太大变化，体育新闻报道也大抵如此，好多赛事基本上是例行公事（后面再详加分析）。

上述提到的这些旧式文人分别是：

蒋芷湘，浙江人，生卒时间不详，经陈莘庚介绍与美查相识，其时功名已经是举人，其人品谈吐为美查所欣赏，故被确定为《申报》的首任主笔，参与《申报》的创刊，除负责报纸的日常的编辑事务之外，自己也不断刻苦攻读，与上海周边的文人一起组织有诗学会，互为唱和，特在《申报》开辟固定版面来刊载旧文人的一些诗词，这一举措，近似于现在报纸的副刊，为报纸培养了一批忠实的读者群。蒋在《申报》工作到1877年，也有说工作到1784年，考中进士后离开报馆，也是《申报》编辑中为数不多考上进士的人，由此也可以推断，当时报人的社会地位很低，寄身报馆仅仅是为养家糊口计，对于功名，仍然是孜孜以求，很少有报人将报馆作为事业来做的。到目前为止，关于蒋的文献资料很少，研究蒋芷湘大多只能从他的一些诗词中去寻觅踪影。

钱昕伯，浙江吴兴人，秀才，与蒋芷湘一起参与《申报》创刊，创刊之前，曾受美查委派到香港《近事编录》进修三个月，与王韬相识，而后成为王韬的女婿，受王韬影响，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比较认同，思想也较为开放。继蒋芷湘之后钱昕伯成为《申报》的总主笔，报纸因此而有所改观，对于新思想和新事物有了更好的关注，评论也更贴近时事，贴近社会，1884年，老丈人王韬回国后，在编辑部兼任顾问一职，《申报》对于资产阶级改良，对于洋务更加热切。只是钱昕伯

身体不是很好，眼睛高度近视，许多具体的编辑事务只能交给何桂笙来打理，直到1894年去世。钱昕伯在申报工作了32年，对于《申报》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钱死后，《申报》由黄协坝接手总主笔一职，黄协坝保守固执，对于维新改良十分反感，此后《申报》报风急转直下，报纸风格日趋保守。

何桂笙，浙江绍兴人。幼年时有神童之誉，曾考取秀才。1873年，他被辛未进士苏州知县周鹤生收为门生，翌年因周鹤生的推荐来到上海，担任家庭教师，曾受教于学者冯桂芬、俞樾，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多次考举人未果，因而绝意功名，一心编报。1876年，进入《申报》，担任钱昕伯的副手。由于他才思敏捷，不久即声名鹊起。光绪十三年（1887年）前后，钱昕伯已年逾六旬，实际上总编辑工作已由他代行。他在《申报》的主要工作是撰写篇首论说。尽管为了《申报》的生存，许多论说写的四平八稳，谁也不得罪，但是其评论的思想性和预见性在当时仍然为时人所称道。他的改良主义思想与钱昕伯和王韬十分贴近，因此在钱昕伯老迈多病之时，放心由他来代理主笔一职。

此外，蔡尔康、沈毓桂、吴子让等都在美查时期参与过《申报》和申报馆的工作，他们中都是有功名在身的封建文人，醉心科举，追求更大的功名是他们最大的人生目标，办报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只是寄身养家的手段，他们的思想都曾经受到科举制度的禁锢，尽管象钱伯昕、何桂笙、蔡尔康等接受过西学的启蒙，但是西学对于他们仍然只是种如西洋镜似的热闹。门户开放后的上海，西学东渐，体育项目作为西方现代化的成果也开始在上海出现，但是要这群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儒雅秀才们，去领会体育项目的真谛进而大规模地报道这些体育运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 1.2 过渡时期（1889—1912年）

1889年10月15日，美查兄弟将其所经营的事业改组为“美查有限公司”，将《申报》作为该公司经营的事业之一，美查兄弟收回原股本2000股（约银10万两）后，返回英国，将《申报》交与买办席裕祺，席裕祺1897年病故后，由其弟席子佩接手。1909年，席子佩以七万五千块购进《申报》全部产权，主权移交给国人，但名义上还是为外商所办，至1912年，因亏损严重而不得不低价转手。此时正值中国多事之秋，重大的社会变动接二连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预备立宪、辛亥革命，每一次社会变动都是犹如惊涛骇浪，将《申报》这只小船摇荡在风雨飘摇的中国。此段时间《申报》事业经营也时好时坏，阴晴不定，主笔也几度易人，按照主笔的不同，首先是保守的黄协坝，而后是留学归来的金剑华，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由留学日本的副总主笔张蕴和担任，报纸人事几经更迭，报纸版面几经改革，但最终难有起色。

黄协坝时期，正值维新运动，清廷对报刊言论控制比较严格，加之他比较谨小慎微，所以处理稿件十分谨慎，对“撰述之稍涉激烈者，记载之略触忌讳者，必于阅总时悉数删去。”其他的主笔们对此虽不以为然，但囿于权限而无可奈何。黄协坝主持下的《申报》到后期更趋向保守。在1898年6、8月间，《申报》先后发表文章，发出无需设立议会、议政府的主张。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黄协坝更坚决站在慈禧一边，著文批判“康梁邪说”，声讨海外逋臣。这样的观点一见于报端，立即引来



对立言论，并延伸到其他方面，笔仗不断。

然而，这些并未改变黄协坝的保守立场。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守旧文章，还于1902年3月刊出《议院不可行于中国说》，表达反对设立议院的观点。《申报》的逆时言论激起了全国舆论界的反感，声誉大受影响，销量日下。当时革命风潮风起云涌，维新改良已成共识，而作为老秀才的黄协坝却抱残守缺，为了取悦当权者，居然对慈禧称臣。到1905年春天，《申报》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年轻报人不甘忍受而纷纷“以病请辞”。面临窘境的《申报》锐意改革，黄协勋被解职归田，结束了《申报》主笔生涯。

黄协坝的保守使得《申报》丧失了很多宝贵的发展机会，也给后世新闻传播留下很值得寻味的警示，其时的上海，报业竞争十分激烈；《新闻报》在福开森接手之后，请汪汉溪担任主编，在商言商，重视发行与广告，事业蒸蒸日上；《字林沪报》有字林洋行的雄厚背景，在报纸业务上不断创新，紧跟时事，其势不下于《申报》；1904年创刊的《时报》许多厉行革新，其报纸业务的一系列创新，开风气之先，其首创时评格式新颖，集当时许多青年才俊。因此，《申报》的日薄西山自然在情理之中。

1905年，在总主笔金剑华的主持下，《申报》做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大量引进留学海外的年轻人进报馆担任编辑，留学日本的张蕴和、王钟麒、刘师培等分别进入报馆担任编辑；其次对报纸业务进行很大的变动，在2月7日的论说栏中宣布了其办报新方针“改变言论，赞同维新变法”，“扩充篇幅，标题力求醒目并开始采用新闻分栏编辑法”，“多载专电、通讯，广译外报评论，改革之后的第二天，《申报》社论180度转弯，一改过去视康梁为叛徒的态度。除了报馆评论的变化外，《申报》的新闻报道也很有起色，新闻的信息量不断增大，新闻电头不断增多，新闻的报道面不断扩大，报纸版面也为之一新，漫画、木刻画等各种形式的新闻图画时有出现。这一年的体育新闻报道较1904年几乎翻了两番，由此可见，此次革新，是以留学归来的中国新式文人对于旧文人办报的一次全面的改革，使得《申报》的办报方针脱离了旧式文人办报的窠臼，开始运用全新的办报理念，全方位地反映和报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之更接近民生与社会了。

改革之后的社论，不少出自刘师培、王钟麒之手，两人均与当时的“乱党”有所接触，特别是刘师培曾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排满的“光汉”，因此两人的评论自然流露出排满情绪，革命党人的激进言论时时见于《申报》报端，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当局的警惕，为了报纸的生存，金剑华不得不劝说两人离开。

1909年，金剑华、雷君曜离开《申报》，主编由早年他们推荐的助手张蕴和担任，张蕴和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他一直在《申报》工作到1940年，直至逝世，期间1909—1912年担任总主笔，1912—1929年担任副总主笔，1929—1938年担任总主笔，1938—1940年担任名义上的副总主笔，他是在《申报》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其文章不温不火，不徐不疾，对于重大国家政治问题尽量回避，力保《申报》不至于卷入政治漩涡，在他的主持下，《申报》老成持重，少谈政治，少谈国事，少发议论，在各种凶险的政治环境中，《申报》事业仍能保持不断的发展。张蕴和的此种性格也决定了《申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能赚钱，但是没有很大起色。此时的《申报》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即1910年创办了《自由谈》副刊，1911年又

进行了一次改革，其最主要点是加强评论和加强新闻，以此吸引受众。但终因经营不善，1912年，在报业大潮的冲击下，销量一路下滑，难以支撑局面，报馆主人席子佩决定将其抛盘出手。

### 1.3 鼎盛时期（1912—1937年）

1912年，史量才联合当时沪上工商名流张謇、应德闳、赵凤昌等人用12万元的价格盘下《申报》，史量才自任总经理，陈景韩为总主笔，张竹平为经理，在名义上仍为外商所有，《申报》的此次易手进入了《申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

史量才（1880—1934年），出生于江苏江宁县，后随父亲迁居松江府娄县泗泾镇。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中秀才。受戊戌变法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先后在泗泾创办了养正小学堂，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为反对清廷向列强借款筑路，参加收回路权运动，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曾亲至石湖荡桥梁工地现场擘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任《时报》主笔。

史量才是《申报》历史上的核心人物，其新闻报道的理念以及报业经营的理念可谓冠绝群伦，他认为，报纸必须有独立自主之精神，这种独立之精神应该是无党无偏，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完全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政治上的自主必须要经济上独立，而经济上的独立是报纸生存和发展的基业，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申报》终于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张最重要的报纸，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植于长江流域的文化之中，现在的上海和江浙一带的上了点年纪的老人称呼报纸还叫“申报纸”。史量才经营《申报》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和名望，但是由于不兼容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其1932年开始的《申报》改革，积极宣传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为蒋介石所嫉恨，1934年，被军统阴谋杀害。

考察《申报》的鼎盛时期，参考政治事件的发生、《申报》重大改革以及主要编辑人员的变更，我们将《申报》鼎盛时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申报》的起步阶段（1912—1922年）；第二，《申报》的稳步发展阶段（1922—1932年）；第三，《申报》的改革阶段（1932年—1934年）；第四，后史量才阶段（1934—1937年）。

#### 1.3.1 起步阶段（1912—1922年）

史量才接手《申报》之后，不惜重金将《时报》的主笔陈景韩挖到《申报》，聘为总主笔，请张竹平做经理，报纸经营之初，由于资金问题办报异常艰难，1915年，席子佩突然发起版权官司，要求赔付25万元，再加上张謇、应德闳无意经营，纷纷撤去股份，幸得上海工商业巨头徐静仁作保才逃过一劫。重生后的《申报》在史量才、陈景韩、张竹平等人的苦心经营下，其现代化脚步越来越快。1916年总发行量达到2万份，1918年建成五层的新报馆，并添置美国最新式的卷筒轮转机，1921年开始采用白话文和标点符号，1922年报纸发行量突破5万份，出版《最近的五十年》大型纪念册。《申报》也从此走向了经济独立、业务发达的企业化大报之路。

陈景韩（1878—1965年）又名陈冷，松江县人。清末秀才。早年留学日本。1902年回国，初任上海《大陆报》记者。后《时报》在上海创刊，受聘为该报主笔，于是锐意进行业务革新，除创设“专电”“特约通讯”等专栏外，还开辟“时评”

专栏，每日写一短评，短小精悍，令人耳目一新，各报纷纷仿效。1913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受聘任该报总主笔。陈景韩性情孤僻，行为乖张，但办报为人却是不媚俗、不做作、不卖弄，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漩涡中，《申报》能做到姿态超然，报格独立，与陈景韩的独立不移的人格是有关系的。

陈景韩主持《申报》笔政16年，主张现代报纸要加强新闻，新闻要去芜存菁，要短小精悍，不仅报道要客观，而且必须忠于事实，以“确”“速”“博”三字为办报要点；慎选记者，发布真实可靠的新闻和明白公正的评论。并且广开新闻渠道，对于好的新闻稿件，不惜高价收买，邵飘萍、黄远生就是《申报》此时最主要的撰稿人之一，邵飘萍在《申报》上发稿共计22万余字，对于当时北洋政府的各种动态，《申报》都详尽予以报道。陈景韩新闻报道“博”的观点，与此前的主笔有很大不同，对于体育新闻这种新事物，报道逐渐多了起来。

起步阶段的《申报》也逐渐吸取众家之长，创办《老申报》《常识》《星期增刊》《汽车增刊》等各种附刊来扩大新闻的报道面，视野非常开阔，对于增进读者的新知识和吸引目标受众是很有好处的。

### 1.3.2 稳健发展阶段（1922—1932年）

此间十年，《申报》逐渐走向成熟，逐渐演变成现代化的大报。报纸发行量不断增加，至1932年已达15万份，除了新疆、西藏少数僻远地方外，国内各地均有发行，报纸的广告份额也不断增多，每年获利在百万元以上。报纸新闻业务不断发展，报纸采访人才济济，1923年采访部主任康通一临城遇险，并直接参与绑架事件的解决，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很知名的一次参与式采访，事情的最终圆满解决令《申报》声名大震。在报纸的编排上《申报》也采用综合编排法，不断改良版面质量，报纸版面越来越清新可读。在报纸栏目的设置上，报纸不断开辟专栏和创办专刊、周刊，以此来扩大报纸的知识含量，组合报纸的信息，吸引特定的读者群。1923年，出版《教育与人生》周刊，专门发表教育新闻，并讨论教育时事，以此与《时事新报》相抗衡。1924年，创刊《本埠增刊》专送本地读者；增辟《商业新闻》版，每日见报，主要报道商业行情；增辟《教育新闻》版，专门刊载与教育有关的信息，绝大部分的体育新闻都收集在《教育新闻》之中。1925年，出版《艺术界》专栏，每日见报，推介艺术作品，报道文艺界新闻。1930年，创刊《图画周刊》，由戈公振主编，印刷精美，随报附送。

1929年，陈景韩辞去总主笔一职，由张蕴和代行总主笔之职，张竹平外出经营《时事新报》，总经理由马荫良继任。

此十年中，恰逢中国政局波诡云谲之时，首先是军阀内战频繁不断，国共两党合作之后，发起北伐战争，在这场民主与进步、团结与分裂、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中，由于《申报》的自身局限性而成了个“局外人”。北伐战争之后连续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之后，《申报》的生存处境日益艰难，国民党当局对新闻舆论界的压迫与控制，使得新闻的报纸评论每况愈下，少谈国事，论远不论近，论下不论上，成为《申报》保全自己，回避风险的重要手法。以前以辛辣冷峻的时评知名报坛的陈景韩似乎感觉处在三夹板之中，现实距他的报人理想越来越远，因此，时评作品很再有早期的独立和新颖，办事风格也越来越谨慎。张蕴和的评论正切合了他的名字“张默”，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时候，他多保持着沉默。

而政治上的“局外人”的处境却恰好对社会新闻、经济新闻、体育新闻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时机，这十年间，《申报》的体育新闻发展确实十分迅速，体育新闻的数量不断增加，对各种运动会的报道时时见于报端。后面将做详尽分析。

### 1.3.3 《申报》的改革阶段（1932—1934年）

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件，此时《申报》开始筹备60周年大庆，将陶行知聘进报馆担任顾问一职，史量才与宋庆龄、邓演达等不断走近，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32年，史量才成立《申报》总管理处，处理一切报馆事物，下设设计部，黄炎培为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陶行知为总管理处顾问。《申报》改革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风逐渐左转。

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改革时评社论，此前的《申报》时评不痛不痒，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在未作出有利于报馆利益的判断之前，一般不发表过激言论，甚至是保持沉默。而此次改革之后，《申报》始终关注政治时事的最前沿，对于日本侵入中国的狼子野心大加披露，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与以沉重鞭挞，不断推进抗日救亡、保障民权的舆论高潮。此时著名的社论有《论剿匪与造匪》《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宋庆龄为邓演达被害宣言》等等，这些社论切中时弊，内容精辟，笔锋犀利，给国民党当局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其次是副刊《自由谈》的改革，总管理处将主持《自由谈》多年的周瘦鹃撤换，改由25岁的留法青年黎烈文主持。黎烈文具有比较强烈的民主进步思想，其一上阵，就“腰斩张资平”将霸占《自由谈》长达二十多年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请出《自由谈》，设置有杂文、随笔、读书笔记、短片译文和连载小说，内容庞杂，力求精湛，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聘请国内知名的作家和学者为《自由谈》撰稿，许多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社会批评事实见于报端，最值得一提的就是鲁迅和茅盾的杂文，他们在《自由谈》成为两大台柱子，其作品似投枪、似匕首，直接指向了政治文化领域中最引起读者关注的重要敏感地带。短小精悍，深刻隽永，为当时的读者所推崇。黎烈文主持一年多，所受到的人身攻击无数，最后不得不离开《自由谈》，接任者张梓生萧规曹随，并未改变《自由谈》的编辑方针，主要的作者仍然不断为其供稿。

除此之外，《申报》的改革还包括创办新闻文化事业：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俞颂华主编，要将该刊办成集政治、经济、文艺为一体的综合性杂志。1932年，创办流动图书馆，起到了普及教育的目的，1933年，创办新闻函授学校，为报界培养新闻人才，1933年开办妇女补习学校，并兴办《申报》之业余学校，1934年出版《中华民国新地图》，各种新闻文化事业的创办使得《申报》的事业不断扩大。

《申报》的改革激怒了蒋介石，1934年，史量才在海宁被暗杀，其后《自由谈》被暂停出版，国民党对于《申报》的高压政策越来越厉害。

### 1.3.4 后史量才时期（1934—1937年）

史量才死后，《申报》的帅印由史量才之子史泳麋接掌，此时中国国内矛盾不断升级，国民党当局对报纸的控制也日趋加紧，1935年《自由谈》暂停出版，《申报》的反抗精神也有所减缓，1936年，主笔张蕴和病重，周梦熊也随后辞职，《申报》主笔暂由俞颂华、伍特公、张叔通三人代理，胡愈之、金仲华为报纸撰写社论，

这些新人的出现，为《申报》输入了新的血液，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之时，《申报》能迅速作出反应，比如对“西安事变”“七君子事件”的报道，都十分及时，所持评论也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为抗日救亡保障人权鼓与呼，特别是1937年俞颂华、孙恩林的延安采访，在国民党的严格新闻检查中，也给国统区的人们透露了“一线胜利的曙光”。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的评论和新闻，揭露日本的侵略阴谋，提醒全国人民，日本的侵略是有计划的，此后每天都有重大言论面世，对战争状态和战争形势进行详尽的剖析，对中国的救亡图存、建立战事体系作系统论述。

#### 1.4 动荡时期（1937—1949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六十多年历史的《申报》也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接受洗礼，战争时期残酷的生存环境让《申报》步履维艰。经过了上海“孤岛”的特殊斗争时期，也经过了在日本的逼迫下不得不就范的屈辱时期。抗日战争胜利后，《申报》因为“附逆”的罪名被迫接受改组，接受官股，成为由国民党操纵的一张地方大报。因此考察《申报》此段时期的历史，我们将其分为三个时期：孤岛时期、屈辱时期、官报时期。

##### 1.4.1 抗日战争中的“孤岛”时期

1937年12月，上海沦陷，为抗日计《申报》将机器设备运抵武汉和香港，于1938年分别出版有汉口版和香港版，10月在上海复刊，名义上用上海美商哥伦比亚公司的名义坚持出版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租界沦陷，在租界坚持出版的三年时间里，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孤岛时期”。在整个“孤岛时期”，《申报》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面对日伪政府的不断冲击，《申报》编辑为了保护自己，在大门口拉上了铁丝网，设置了路障，但仍然还出现投弹、暗杀等现象。

整个孤岛时期，《申报》一直站在宣传报道救亡图存的第一线，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鼓励青年们到抗日的最前沿去，到游击区去，揭露汪伪政府的阴谋，谴责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一个个血腥罪行，这些报道和言论对增进中华民族的团结，对提高救亡图存的信心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孤岛时期”是《申报》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也是《申报》历史上最悲壮的时期。

##### 1.4.2 屈辱时期

1941年12月，在日军的胁迫下，《申报》复刊，复刊后的《申报》完全为日本军部所控制，但仍使用美商的牌子，欺骗读者，1942年11月，日本军部突然派人查封《申报》，并勒令全体职工撤离报馆，12月，日本海军牌汉奸陈彬龢以军管会的名义接管《申报》，并任命陈彬龢为社长。

陈彬龢1931年春进申报馆工作，任社评主撰，以左派“爱国志士”的面目出现，曾撰文谴责日军暴行。1932年底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与戈公振、邹韬奋等一起发起筹备出版《生活日报》。1936年夏去香港。1942年由日本海军部支持出任《申报》社长。1943年1月发起组织“上海市新闻联合会”，自任理事长，专门替日伪宣传，吹嘘日本海军武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他潜逃日本。

### 1.4.3 官报时期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日本投降，《申报》随之停刊，12月，《申报》复刊，但此时《申报》已不是抗战之前的《申报》了，国民党当局以“附逆”的罪名将《申报》所有的资产查封了，任命潘公展为指导员，立法委员陈训愈为总经理兼总编辑。1946年强迫史泳赓将《申报》51%的股权让与政府，成为官商合办的报纸，杜月笙任董事长，史泳赓任副董事长，社长与总主笔为潘公展。

随着内战的不断升级，物价飞涨，《申报》的财力也捉襟见肘，版面由两张半缩至两张，发行数字锐减，广告收入也每况愈下，几乎无法维持。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5月27日，《申报》停刊。

## 2 《申报》体育报道的历史分期

### 2.1 历史分期的依据

“历史学的目的是有限的、朴素的和人文的。其中包括追忆往事、记述功业、道德评价、得失教训和因果探寻等。近代人类的视野和雄心都扩大到了要解释一切的程度，历史学的目的也就扩大到要把历史上的一切容纳到某种统一的逻辑、模式或者体系中去”。而这种逻辑、模式或者体系必须是有层次的，能够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特征的，简言之，就是对历史进行符合逻辑的时期划分。因此，可以认为：正确的历史分期是理解历史规律重要的不二法门。历史分期本身不是什么复杂的概念，简言之，即将历史进行分期。但是历史分期应该怎么进行，按照什么样的依据分期，历史分期有什么意义，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工程。

《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历时77年，经过了清朝末年、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如果仅仅按照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来对《申报》77年的历史进行分期，虽然省时省力，但显然是不科学的。无法对《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历史进行阶段性的整理和分析，也无法对其体育报道内在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总结。因此，本研究对《申报》体育新闻报道进行历史分期时摒弃了近现代历史传统的分期方法，而是循着《申报》以及其他报纸不同阶段的体育新闻报道的不同特征来进行分期。

对《申报》进行历史分期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四点：

首先，体育新闻报道的数量和内容是对《申报》体育新闻报道进行分期的最主要的依据。整理了《申报》77年来体育新闻报道的所有新闻数目和新闻标题，《申报》在两个时间段比较以前的新闻数量增加很快，其一是1905年前后，其二是1923年前后。与此同时新闻的报道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1905年与此前进行比较，关于运动会的新闻开始增多；1923年与此前的体育新闻进行比较，西方现代竞技的内容有所增加，而武术、赛马等民间传统体育的报道有所减少。

其次，考察《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必须结合《申报》的发展历史。在考察中，发现不同历史时期《申报》主编的历史文化背景、主编的报道思想和其对体育知识的认知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某一历史时期《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报道规模和报道方式。比如，《申报》创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的体育仅限于在洋人的租界里举办为数不多的一些体育比赛，国人根本没有体育的观念，所以体育新闻

报道自然也就是只鳞片爪，难觅踪迹；到了1905年，日本留学回来的张蕴和主持笔政，对《申报》进行了一次全新的改版，其报道理念与思想比之以前的保守派黄协坝有了巨大进步。1923年前后，《申报》发行量突破两万份，正式成为企业化的大报。当时的主编陈景韩非常重视体育报道，在全国率先设立“体育科”，聘请了专职的体育记者和体育编辑。这些都成为考察《申报》体育新闻报道历史分期的重要依据。

再次，体育事业的发展是体育报道的基础，近现代体育的发展决定了《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申报》虽然是全国性的大报，但是还是以报道上海的体育赛事为主。因此，要对《申报》体育新闻报道进行正确的分期不得不考察上海乃至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的基本轨迹。1905年，同盟会会员何亚雄，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所专业体操学校—松江体操练习所，这也许就是中国体操运动普及和推广的一个契机。1924年，在《申报》的推动下，中华体育协进会成立，协进会是民国期间唯一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其最初的办公地址就设在《申报》馆内。《申报》馆体育记者蒋湘青就是该协进会的干事。自1923年开始，《申报》体育报道出现飞跃性发展也就不足为怪了。

最后，教育的发展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是对《申报》进行历史分期的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体育新闻报道的繁荣必须需要读者，清末很长时期内，体育报道之所以寥寥无几，与体育新闻的受众稀少是有关系的。1905年开始正式施行“癸卯学制”，在各级各类学校都强行推行兵操课，兵操课的推行既推动了体操活动的盛行，为《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提供了内容，同时，兵操课的施行也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喜爱体操、从而喜爱体育的读书人。1922年，“壬戌学制”实行，规定无论小学、初中、高中都必须开设体育课，体育课的基本内容就是现代竞技体育中的许多常规项目，诸如田径、足球、篮球等等。体育课培养了现代体育事业的参与者，同时也培养了具有现代体育观念的《申报》体育新闻的受众。

## 2.2 四个历史时期

在完整掌握了《申报》体育新闻报道所有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根据上述四个进行历史分期的基本标准，将《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分为四个阶段：滥觞期、朦胧期、成熟期、动荡期。下面简要将每个时期的划分依据和每个时期的一些基本特点略做阐述。

### 2.2.1 滥觞期（1872—1904年）

早在1872年的《申报》创刊号上，《申报》就刊载了一篇名为《驰马角胜》的体育新闻，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体育新闻之一，也是《申报》最早的体育新闻。有研究者以此推断，《申报》有注重体育新闻的传统，其实早期的《申报》对于体育新闻是很不重视的。《申报》创刊之后的漫长的30多年间，一直处在体育新闻报道的滥觞期。

滥觞期是指在此时间《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还是刚刚起步，在整个时期里，体育新闻仅仅只是《申报》的一个小点缀而已。因此，从来没有主动的去报道体育新闻，都是被动地报道一些影响较大的体育活动。比如赛马，登载在《申报》上的赛马新闻也坚持几十年不变，看上去就好像例行公事而已，没有多少新意可言。

虽然在此时期，洋务运动已经开始，各种兵操训练也已经经常化了，足球、篮球、网球、保龄球等体育项目也已经引进中国，洋人的赛马、赛船等体育活动已经开展，但是《申报》的体育报道却是很少的。一年下来，体育新闻报道的数量不过区区一二十条，而且大多篇幅简短，写法拙朴。带有强烈的封建旧文人的歌赋特色。

滥觞期的《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特点，与当时编辑的体育观念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申报》早期的编辑都是科举失意的旧文人，旧文人的观念局限了他们对于新闻对于体育的认识，因此研究早期《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必须研究晚清时期文人们的新闻思想和他们的生活情趣。

### 2.2.2 过渡期（1905—1922年）

1905年对于《申报》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把持《申报》10年之久的总主笔的黄协坝在年轻编辑们的逼迫下终于辞职。黄协坝顽固守旧，醉心官事，为了讨好慈禧，居然在报纸上主动称臣。黄协坝下台后，金颂华主持笔政，留日归来的张蕴和协理，《申报》做了很大的改革，这次改革对于《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契机，打开1905年的《申报》，发现体育新闻骤然增多，1904年才不到20条，而1905年已增加到90多条，基本上每个星期都有体育报道，而且出现了体育漫画，介绍推广体育知识。所以，将1905年作为一个重要的分界点。此前的报道一直是简单而又稀少，而此后开始变得接近现代体育观念了。以至于后来史量才的1912年改革也没有将《申报》报道体育新闻的这种模式打破。

1905年之后的《申报》体育新闻报道进入了一个过渡期。称之为过渡期，主要是指在《申报》这段时间的体育新闻报道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各种报道题材杂糅，学校体育、竞技体育、赛事新闻、军事体操、武术杂闻，基本上是有闻必录。而且是不分门类，没有体育新闻的专栏，杂陈于报端，报道手法简单，篇幅极短，甚至沿袭早期《申报》旧文人对体育报道的一些报道方法，报道风格也是大杂烩，有白话文的新闻、文言文的新闻等等，长短不一，参差于报纸版面各处。

过渡期《申报》体育新闻的情况，受到当时中国纷乱的体育思潮的影响。此时的体育界，军国民思想、民主科学思想、国粹思想纷争不已。作为历史记录者的报人也就莫衷一是，干脆凡是与体育有关的新闻信息“拣到篮里便是菜”。因此体育报道虽然多了，体育报道的形式却是十分简单，体育新闻在《申报》的编辑们看来，还是用来作为报纸补白的材料。

没有正确的体育新闻报道理念，没有对体育正确的认识，体育新闻报道仍然还是不成熟的，这就是过渡期间《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重要特征。但这个过渡期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对于滥觞期的拙朴和简单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 2.2.3 成熟期（1923—1936年）

《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成熟期源于1922年，其时《申报》开始全部采用白话文写作，白话文写作是一个用来划分阶段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标志。之所以说1923年《申报》新闻报道已经进入成熟期，有其重要原因：其一，《申报》此时已将体育新闻作为新闻的一个特定门类来加以报道，将所有体育新闻报道放在《教育与人生》的专栏里，体育新闻不再是用来补白的材料了。其二，《申报》对于大型体育赛事的报道开始成熟，常常开辟专栏来报道大型体育赛事，而且报道手法逐渐



多样化。其三，体育报道的形式开始多样化，既有文字报道，也有图片报道，既有消息，又有通讯。其四，体育的观念逐步现代化，这些观念的现代化反映在体育新闻报道的很多评论之中。有了这些特征，将这段时期称之为体育新闻报道的成熟期。

成熟期也是《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鼎盛期。在此期间，中国体育特别是上海体育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上海体育的繁荣与“壬戌学制”的颁布是分不开的，新学制彻底使得中国告别了军国民主义的日本模式，而倾向于实用主义的英美模式，在小学、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普遍开设体育课，而且体育训练的内容不再局限于兵操或者体操，而是各种现代竞技体育的项目都能进入课堂，这样为中国体育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上海体育的繁荣和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申报》提供了源源不尽的报道题材，远东运动会、全国运动会、埠际足球赛，诸如此类的大型赛事每年在上海都有举办，再加上民间体育的兴盛，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了体育爱好者的乐园，体育新闻报道的兴盛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成熟时期的《申报》体育新闻报道与前两个阶段的体育报道具有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体现在报道数量，而且体现在许多大型赛事报道的成熟上。当时上海报业对于体育新闻的竞争是非常激烈，在这些激烈的竞争中，《申报》也不甘示弱，积极探索体育新闻报道的新方法和新手法，而且取得了成功。这些成功的报道手法和经验至今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到1937年上海抗战之后，随着日本的侵入，《申报》自身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亦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第三阶段将之划定到1936年。

#### 2.2.4 动荡期（1937—1949年）

将此时期称之为“动荡期”，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时局的变化使得《申报》的体育新闻报道产生很大的变化；其二是体育自身在动荡的时局中产生的变化也影响了体育新闻报道的变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底，上海沦陷，《申报》先是出逃上海，出汉口版和香港版，稍后，又转回上海租界“孤岛”，通过“挂洋旗”的方式坚持出版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为日伪政府所侵占。1945年抗日胜利后，又被国民党当局改制，加入官股，操纵于当局的股肱之间，失去了独立自由的报道。时局的动荡变化必然带来《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报道的主题和报道的内容上。

时局的动荡不安，使体育背离了体育本身应该具有的色彩。体育不再是强身健体、娱乐大众的工具，而成为各个不同的政治利益团体阐述自己政治诉求的特殊方式，体育染上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色彩。首先是抗日救亡的政治诉求，其后是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的工具，再后又成了国民党当局表达党同伐异的政治思想的工具。被赋予了各种政治颜色的体育再也不是以前的那种纯粹的体育了，体育的这些变化自然也深深影响到《申报》的体育报道。此时的体育报道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向，新闻报道的政治倾向性逐渐明显，政治意味逐渐加浓。

动荡期的《申报》体育新闻报道的内容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体育新闻报道业务还是不断走向完善的，报道的手法还是多样的。